



亞洲神學

開始引發問題(上)

谷寒松著
劉賽眉譯

本文主要是描述亞洲神學從事本位化的努力

這是亞洲神學萌芽的時候了！我本非亞洲人士，却能夠參與了亞洲神學生命的成長，使我額外地感到興奮和欣悅。就如亞洲人民所熟知的，生命本身充滿奧秘，故此當我描述亞洲神學生命的發展時，亦懷着極為尊重和細緻的心。另一方面，我亦深知，在如此簡短的一篇文章內要鳥瞰整個亞洲神學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對於前人已發表過的思

想及著作，在此不再詳贅。（註一）

亞洲的三大文化是印度文化、馬來文化、和儒佛文化。ALOYSIUS PIERIS（註二）把這三大文化領域劃分為七大言語區：首先，在亞洲西部邊界地方是閃族語系區；在亞洲西北部以及蘇聯接近亞洲的一帶，屬烏拉阿爾泰語族區；亞洲南部居民大都說印依語和德拉威語；漢藏語區在亞洲是最

大的，由亞洲中部伸延至遠東。亞洲東南部屬馬來語族區。最後，在亞洲的東北端是日語區，日語在諸語系中自成一格，不能歸入其他語系的範疇內。（註三）

不少的研究曾經以亞洲的現況為探討的對象，（註四）各種的研習會和大小會議也曾以此為討論的主題。（註五）這些資料都可視為亞洲生命孕育的溫床，從這些資料裏，我們可以看到亞洲神學家的努力，並嚐試去把握住這個尚在成長過程中的神學所提出來的種種問題。約於十六年前，即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斯里蘭卡召開的東亞基督徒會議（註六）曾發表了以下的聲明：

一個生活神學的誕生，是由於一個生活的教會與世界的不斷相遇。我們從亞洲的啓蒙和革命中去分辨出神學的特殊任務，因為我們相信：天主會引導世界的各種運動達至祂自己的目標。到目前為止，亞洲各教會尚未足夠認真地負起神學反省的責任，她們只滿足於接受西方神學所提供的現成答案。無論如何，我們相信，今天我們可以在亞洲發展一個真正的生活神學。（註七）

草擬這個宣言的作者們說得很對。一位日本神學家（註八）在一九七四年時曾說了這樣的話：「第三世界神學的開始是以引發問題為主，而非只為吸收和消化奧斯定、巴特、和拉納的思想。」（註九）然而，如何去引發問題？亞洲神學所關心的主要又是什麼？本文就是想按着三個步驟來回答上述的問題。首先，在本文的第一部份，我會與讀者分享過去三年來我參與三種不同神學會議的經驗；在第二部份，我會根據這些經驗來指出目前亞洲神學中的某些重要因素；最後一部份將會討論亞洲的不同神學思潮所引發

出來的迫切問題。

I. 三種不同的經驗

(1)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至二十日，「第三世界神學家合一聯會」（註十一）在斯里蘭卡的WENNAPPUWA 召開了一次「亞洲神學會議」。（註十）這次會議為我個人來說，是一次既震撼我的存在又具有救恩意義的經驗。在會議中可以真正地經驗到科際交談的努力，對理論和實踐的結合提出挑戰。有時，討論的氣氛是如此激烈，幾乎使整個會議停頓和解散，原因是雙方的思想皆走向極端，強烈對壘。會議中最基本的思想衝力是由下而上的，來自強調實踐、支持受壓迫者、和投身於社會行動，這一切對維護神學多元性的神學家和教會人士而言，委實是很大的衝擊，他們主張不同的觀點和神學視野可以共存。為我看來，下面的一段話很可以代表那次「亞洲神學會議」的中心訊息：

面對亞洲的貧窮、人口擠迫、被支配和被剝削的處境，我們的神學必須具有一股解放的衝力。

神學的第一個行動是投身，它是神學的心臟。這種投身是回應窮人在爭取人性尊嚴時所提出的挑戰。我們肯定，天主召叫了亞洲的窮人和受壓迫者成為他們自己命運的建造者和設計者。因此，神學的出發點是受壓迫者爭取完整人性的渴望；重視他們的覺醒、和不斷除去一切阻礙他們達到歷史中的真理的經驗。為了得到真正的解放，神學必須是由那群已經意識到解放的需要的窮人開始。他們利用聖經學家、社會科學家、心理學家、和人類學家等的專門技巧來

表達出他們內心的覺醒。這份覺醒可以用許多不同的方式來表達，比方：藝術、戲劇、文學、通俗故事、和民間智慧等；亦可以在教理和牧民的宣言中來表達。（註十二）

在這次會議的最後聲明中，聖經學家尚且爭取得一席之地，至於系統神學家，則全無踪影。目前，在神學上，我們是面臨着一股新的衝刺，在本文的第二及第三部份，我們會更深入地探討這種新的趨勢。

(2)在一九八〇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六日，東南亞神學院協會在泰國的 PATTAYA 舉行了一次座談會，主題是：「亞洲的處境為建立本地神學的重要性」。（註十三）這次座談會是代表了整套計劃五大階段中的第一階段。（每兩年召開一次會議，在十年內陸續完成這五大階段）這五個階段的主题如下：

- 從事亞洲神學的方法及亞洲的處境
- 在亞洲尋找一套新的神修
- 亞洲基督徒人學的要素
- 在亞洲的處境中去了解耶穌基督
- 瞭解天主的奧秘

出席第一個階段的座談會（註十四）的人士，共有四十人左右，（註十五）分別來自十四個國家，共同尋求在亞洲的處境中從事神學工作的方法。與會者大部份是神學教師（與上述的「亞洲神學會議」情況不同），其中亦有教授其他科目的亞洲教師，和來自奧國及美洲的代表。近年來，在亞洲建立一個處境神學的任務，顯得愈來愈迫切，尤其是當我們面對着以下兩大問題時：第一，雖然我們了解了聖經原來的意義，但當我們把這意義在我們目前的處境中來表達時，便困難重重。我們必須找出方法，使聖經在亞

洲的環境中發生意義。第二，我們愈來愈發覺到，歐洲和北美洲的神學方法，不適合於我們的環境。近年來，我們不斷地問：亞洲種種急迫的問題對於了解福音中的真理方面，會否帶來一新的幅度，而這種新的了解難道不會使亞洲產生一種別具風格的本地神學嗎？

經過了七天的演講及討論，雖然大家都清楚知道，前面的路程十分艱鉅，充滿爭扎，意見亦不一致，還須要不斷地努力探索研究，但座談會進行到最後時，大家都充滿希望，相信一個屬於亞洲的神學最後必會誕生。

我們可以見到從事建立亞洲「處境神學」的人士的掙扎、甚至是焦慮；另一方面，他們又充滿喜悅和新發現的驚訝。在討論中，時而爆出笑聲、時而閃爍智慧的靈光、時而互相接納、時而彼此爭論。由此可見，從事神學工作委實是一個真正地屬於人的工作，有血有淚。無論如何，若與第一個「亞洲神學會議」相比，這次座談會比較溫和，沒有太過激烈、強硬的爭論。這次會議的氣氛緩和而開放，與會者頗能找出亞洲的特性，我們相信，亞洲的文藝、靈性生活、和亞洲人喜歡具體的事物等因素都會影響到亞洲神學的發展。

出席這次座談會的亞洲人士，堅持要擺脫來自其他文化及其他時代的思想模式（比方：希臘思想、黑格爾思想、和笛卡兒思想……等）。他們感到自己曾深受這些模式的影响，故此強調要努力爭取自由，重新發現自己亞洲的身份。

在會議結束之前，我們問自己：我們應當往那個方向走？雖然，福音和人民的渴望二者都要求我們去發展一個不斷指向未來的

「處境神學」，但我們仍要繼續追問：應以何種方式去認識天主的工程？這個天主在基督身上、在我們的歷史和傳統中已經表達了自己。爲了決定基督徒的團體應如何去參與塑造人類未來的工作，我們必須聆聽人民的聲音——特別是詩人和藝術家的聲音。在目前的环境中，我們需要對受壓迫者和無辜犧牲者的問題特別敏感。我們聆聽和參與行動的目的，是爲了要分辨出福音的確有改革不義制度、解放人類，和使人性在基督內圓滿實現的力量。從此，一個顯示出福音的智慧和能力的神修學亦要誕生，因而，下一個階段的座談會，以「尋找一個新的亞洲神修學」爲主題亦甚爲恰當。（註十六）

(3)第三個會議是「耶穌會東亞參贊區神學家會議及社會分析研習會」。（註十七）這次會議的目標很多，除了提供一個機會，讓參贊區的神學家彼此會面以外，還促進他們與一些專門從事社會分析和社會工作的同伴交談。（註十八）希望藉着這樣的科際交談，會更實際地了解到歐魯伯總會長所說的「神學反省的使徒工作」。

由於參與這次會議的耶穌會士來自不同的文化和思想背景，在交流的過程中，難免會感到挫折和不確定，但亦同時感到大家的意見逐漸趨於一致。雖然，對於某些「神學反省」和「社會分析」的問題（註十九），與會者仍感到不太清楚，但在會議中却有幾點是很清晰的：第一，神學反省既非神學院中的傳統理論神學，亦非純粹是基層基督徒的信仰分享；但神學反省與上述兩者有關。基督徒的團體往往是神學反省的溫床，而神學院亦堪稱爲是這種基督徒團體，它引進科際交談，亦要求理論與實踐的合一。神學反省是一種多方面的思想過程。面對着今日世

界的問題，神學家在一個生活的團體內，運用他細緻的良心和具有高度分辨能力的意識，進行反省，他們很明顯是需要社會分析的幫助。第二，在會議中，大家都敏銳地覺察到從事社會分析的人身上往往潛伏着某些假定、偏見、價值肯定和世界觀。這就是所謂「問題中的問題」。（註二十）其實，嚴格而論，沒有所謂特殊的「基督徒社會分析」，亦沒有「馬克斯主義的社會分析」。（註二十一）換言之，如果一個基督徒選擇站在窮人一邊，投身爲受壓迫者服務，則他（她）的社會分析就會潛意識地受到這種選擇（或假定）的影響。第三，在許多不同的國家，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國家，當實行社會分析時，注意力往往集中在經濟和政治的事實上，其目標也似乎在於改革目前社會的不義制度和政治架構，以便改善人民的生活環境。耶穌會的神學家認爲，這種態度過於狹窄，社會分析的任務不能有效地完成，除非我們瞭解不同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心理、和宗教的結構，而這些結構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每一個層面——譬如：個人內在的生活，人際關係，大小社會生活。社會分析就是揭開這些架構，弄清它們之間的關係、運作的模式、原因與目的。從事這種分析的人亦應謹慎地反省他潛在的偏見，好使這分析更可靠，事實上，這種分析本身應當是很客觀的。

很明顯，從事這種社會分析（有人願意稱它爲「人類處境的分析」，或者是：「人類整體現實的分析」）需要各門學科的攜手合作，它須要借助於各門有關的人文及社會科學，要求合作者的誠懇交談。社會分析固然可以幫助神學家更好地了解人類的境況，而神學反省亦可以協助科學家在更深一層的

結構中來進行分析的工作，這就是信仰的視野所打開的「意義」的結構。

每一門學科都有它自己的理論和方法，也有它的獨立性。在應用這些學科時應避免走向兩種極端：一種是力求客觀，以致於毫不批判地全盤接受它們的結論，尤其是當這些學科已經走出了它們的經驗基礎時。另一種是把它們完全屈服在宗教信仰的特殊方向之下，以致於把它們全部變為「神聖」的思想。與會的神學家認為，近代應用在聖經詮釋學上的「歷史批判方法」，以及哲學在神學反省上所扮演的角色，都可作為了解神學與人文及社會科學之間的關係的借鏡。第四，如果在亞洲的環境中從事社會分析，則此分析必須具有亞洲的「特性」，就是：如果要更深地了解亞洲人的處境，則不可忽略「直觀」和「靈犀相通」的重要。（註二十二）在此，又是一種辯證性的認識過程。「分析」固然有批判的作用，但「直觀」的認識不僅能夠「整合」，而且它能夠深入到一些用實驗和分析不能達到的層面。

這種「直觀」及「靈犀相通」的認識為我們從事分析的工作尤為重要，因為我們的工作不是止於對某種環境的了解，而更重要

是在聖神的引導下，以更恰當和更明朗的方式來宣揚福音，經過分析和分辨的工作後，擬定一套可行的牧民方案。

第五點是在最後一週的討論和反省中提出來的，當時，耶穌會東亞參贊區神學家會議與社會分析研習會的兩組參與者再度會合，繼續交談。很明顯，社會分析的一組在「衝突」的模式方面下了不少工夫，所謂「衝突」的模式，基本上是注意人類及社會中衝突的事實，認為「衝突」是引起社會改變的主要方法。而神學家會議的那組人則較為注意「一致」的模式，所謂「一致」的模式，基本上是注意人類及社會中和諧一致的事實，認為「一致」是改變社會的主要方法。在這次馬尼拉的會議中，這兩種解釋社會變遷的基本模式開始進入交談，以後尚有很長的路程要走。

以上，我簡述了出席三次不同性質的神學會議的經驗（斯里蘭卡、泰國、及菲律賓），每一個會議都仿如一條滾滾的溪流，夾着許多神學的靈光與智慧，向前奔湍。在本文的第二部份，我們會縱身於亞洲神學的大流裏，嚐試去追尋它那緩緩的流踪。

（附註請參閱英文版）

